

陈明远 著

人·仁·任

现代文化人生活丛书



新青年
...

河南人民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现 207932790

I267

C510

人·仁·任

陈明远 著

10

河南人民出版社

79327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仁·任/陈明远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4.1

ISBN 7-215-05025-4

I. 人… II. 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5129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1-5 000 册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5.00 元

前 言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关于现代文化人的人格个性、人际关系、仁德仁爱、仁义礼智、任务和责任、任重而道远……的随笔散文集。

本书通过笔者所亲知亲闻甚至亲眼目睹的一些动人的故事,通过对于历史真相的发掘和考证,描述文化界著名人士的多方面人格形象,以及他们对于人性(包括人格个性)的追求历程,提供读者们“以人为鉴”。

人——乃万物之灵。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体现为“仁”,人对社会文明发展的努力则体现为“任”。

“人士”这一称呼,最早见于《诗经·小雅》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现代仍泛指社会上有名望、具有代表性的人们。本书所写到的如鲁迅、郭沫若、宗白华、田汉、夏衍、阳翰笙、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以及梁启超、严复、蔡元培、胡适……都是现代中国文化界公认有杰出贡献的人士,即“人杰”,也就是智力才能特殊的人物。宋代李清照诗云:“生当作人杰。”他们担负起了“社会中坚、思想先驱”的重任。他们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甚至今后一直可以为人为师表,堪称“人师”。《荀子·儒效》云:“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又《韩诗外传》卷五云:“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当然这“师”体现为多

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成功之处固然可为“师”,而前车之鉴也应为“师”。

在现代心理学的基本概念(术语)中,“人格”Personality 又可译为“个性”,两者大体相重合,但也有学者认为“人格”与“个性(个别性)”Individuality 之间有同有异,或大同小异。简言之,中国几千年传统思想(或“集体潜意识”)对于“人格”的认识和实践,往往侧重于仁义道德人伦责任方面,即“人品”Moral Quality 和“人道”Humanity 方面。

仁,是中华民族自古至今最重要的道德范畴。《礼记·中庸》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又《墨子·经说下》云:“仁,仁爱也。”汉代《说文·人部》解释道:“仁,亲也,从人、二。”本义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

孔子阐述“仁”,其内涵包括忠恕(宽容)、恭信、敏惠、智勇、孝悌等,而强调“仁”的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又专指“具有仁德的人”,即“志士仁人”。《论语》云:“汎爱众而亲人。”又载(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仁义礼智,称为“四端”,是人生道德、观念的基点,道德行为的支撑。《孟子·公孙丑上》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端”是人们生来固有的本性,即人性。真正的仁义、仁道,是值得以生命去追求的。孔子在《论语》中留下一句千古不朽的格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中国现代文明、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而牺牲的李大钊、瞿秋白、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烈,直到“文革”十年浩劫中被邪恶势力迫害致死的田汉、老舍等前辈,是“杀身以成仁”的实践者。

《论语·泰伯》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庄子·

秋水》云：“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所说的“任士”就是能够担负社会责任、完成历史任务的志士仁人。孟子关于“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著名格言，早已是学者皆知了。古代的“志士仁人”发展到 20 世纪上半叶，形成了现代化社会一个极重要的中坚阶层——从 1919 年到 1949 年，他们自己称呼自己为“智识阶级”。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发表了《智识阶级的胜利》一文指出：“智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智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智识阶级的后盾。智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鲁迅先生自认为属于“中产的智识阶级”。新文化界的大多数著名人士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朱自清、瞿秋白、陶行知、成仿吾、冯乃超、冯雪峰、李初梨、苏汶、邹韬奋、储安平……甚至老派人物如梁启超等，普遍接受并使用了“智识阶级”这一概念（术语）。一直到 1947 年，朱自清先生在其系列文章中再三指出——

“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是个新时代，新时代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产生了我们的智识阶级。这智识阶级跟从前的读书人（士）大不一样，包括了更多的从民间来的分子……”

朱自清分析了智识阶级的根本是人格独立，主张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

本书考证了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智识阶级”及其重要哲理“个性主义”的发生、发展过程。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人·仁·任》是一面社会历史与文化的镜子。但它绝不是“戏说”、“调侃”的哈哈镜，而是花费了十几年心血尽可能打磨得平实、平正、平净，以映出中国 20 世纪现代化进程中的仁人志士们的高尚灵魂，立为新时代可资参照的“通鉴”。

陈明远

1999 年 12 月 30 日—2000 年 1 月 1 日于北京丝竹园

目 录

一、现代文化人的交际场——咖啡店	1
田汉首次表现“咖啡店情调”	2
“公啡”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3
鲁迅先生和“公啡”咖啡店	4
[附]关于“左联”与“公啡”的补充资料	6
首次进入中国电影的咖啡店	10
DDS 的常客	12
DDS 的一幕惨剧	14
知识阶级的茶座	15
二、四条汉子的人格	19
活跃型——田汉	20
求全型——夏衍	22
平和型——阳翰笙	25
魅力型——周扬	27
[附]人格个性分析的史料说明	30
关于田汉活跃型人格个性的史料和旁证	31
关于夏衍求全型人格个性的史料和旁证	39
关于阳翰笙平和型人格个性的史料和旁证	47

关于周扬魅力型人格个性的史料和旁证	55
三、高处不胜寒	65
丁东访陈明远谈话录	65
[附] 郭沫若儿子郭世英之死	73
白杨忆郭沫若	74
[附] 我亲知的一件事	86
对历史负责	88
关于《郭沫若致陈明远书信》的公开信	118
[附] 郭沫若女儿批评陈明远篡改郭老信件抬高自己	131
法律工作者钱兴文:关于《郭沫若书信集》	132
文坛佳话忘年交	134
四、“智识阶级”考	156
五四前夕“智识阶级”术语的出现	157
“智识阶级”的来龙去脉	160
如何从“士”脱胎换骨	164
智识阶级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169
胡适心目中的智识阶级	172
智识阶级的俄罗斯情结	175
鲁迅的俄罗斯情结	181
“智识阶级”的欧罗巴情结	184
“智识阶级”的自我界定和分化	188
“无产阶级文化大批判”溯源	190
“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	196
瞿秋白关于“知识阶层”的新提法	198
关于“智识阶级”的论争	201
智识阶级——未完成的交响乐	207

五、“个人”和“个性主义”考	215
“个人主义”概念在中国的出现	216
《青年杂志》倡导个人主义	219
严复、高一涵对于“小己主义”的思考	222
易卜生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	226
蒋梦麟倡导“个性主义”	227
李大钊讨论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	229
陈独秀讨论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	231
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	234
对个人主义的无情批斗	237
瞿秋白关于“个性主义”的新提法	243
对“个人主义”的不同理解和主张	245
 “人·才·戏”三部曲后记	 249

一、现代文化人的交际场 ——咖啡店

北京有老舍笔下的茶馆,江南有鲁迅笔下的酒楼,土生土长的茶馆酒楼是中国古老文明的风景线,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 000多年以前的奴隶社会。但咖啡店则是近百年西方文明进入中国通商口岸的舶来品。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我们多次在访谈中听到老前辈田汉、夏衍、阳翰笙以怀旧的感情说起老上海的咖啡店,念念不忘。他们说:在巴黎和马德里等文化名城的旧区老街旁,有一些咖啡店已经成为历史文物;尽管铺面狭窄、设备简陋甚至烟熏火燎,然而因此更加珍贵。当地居民自豪地向观光客指点道:“这里是波德莱尔、罗曼罗兰和海明威……常来高谈阔论的座席,那里有马奈、凡高、马蒂斯和毕加索……留下的足迹!”

老前辈们指出:在上海也有这样足以自豪的咖啡店。其中有两处特别具有文化史的价值,值得纪念,应当作为历史文物加以保护:

第一处是靠近虹口公园、四川北路底的“公啡”;

第二处是淮海中路的DDS咖啡店。

五四以来,几代中国文化人跟老上海的咖啡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极左的文化专制时期,这种缘分被粗暴地割裂了、践踏了,

但是老上海的“咖啡店情调”，那浓郁、略带苦涩而又异常甘美的芳香，仍然久久地飘荡萦回在几代文化人的心底、梦境。

田汉首次表现“咖啡店情调”

1921年12月田汉（当时23岁）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创作的独幕诗剧《咖啡店之一夜》，乃是中国作家首次在舞台上抒发“咖啡店情调”。当时郭沫若以为田汉的灵感得自于东京银座的咖啡店，其实不然。据田汉生前亲口告诉我：该剧的背景是老上海的咖啡店。田汉在1916年、1919年间，曾经几度光临上海，在虹口“公啡”咖啡店流连忘返，诗剧《咖啡店之一夜》的受孕，恰在其时。

“公啡”咖啡店坐落在老上海公共租界边缘、中西文化的汇合点上，北四川路和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交叉口。它有几十年历史。据传店主是个犹太人，一说是挪威人。但周围居民有不少日本人，如著名的内山书店（鲁迅的好友内山完造所办）就在马路对面。20世纪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夏公、阳翰老回到上海时，也一再寻访过“公啡”的旧址——北四川路998号（旧门牌）。

这座咖啡店分两层，楼下的格局跟田汉诗剧中描述的相似：正面整个墙上镶玻璃镜，柜台上放置咖啡暖罐、牛奶暖罐以及杯盘餐具等。右方有门通厨房、内室，障以布帘。前面是几个圆桌。装饰有日本式的花瓶、盆景，颇为雅致。

田汉剧本中没有涉及咖啡店2楼。“公啡”2楼为西餐厅。临街是一排宽敞的大玻璃窗户，沿着窗户排列着4座车厢式的餐桌，座位两两相对，木椅的高背正好把各个餐桌的客人隔开。另外还有单独的包间。

诗剧男主角的模特儿是田汉的好友李初梨。他们两人曾经在咖啡店共饮，感叹人生的酸苦，宣泄胸中之不平。诗剧中写到的俄

罗斯盲诗人,正是指怀抱吉他浪游世界各地、于当年10月来到上海的俄国艺术家爱罗先柯(鲁迅在文章里也多次提到过他)。诗剧中的女主角、为寻找昔日情人而进城暂时服务于咖啡店的女招待白秋英,则是出自田汉虚构,但于生活中亦有所本。

田汉《咖啡店之一夜》的基调是个性的觉醒、自由的渴望,是对于金钱和权势社会的悲愤和蔑视,是“新浪漫主义”(也即现代主义)的体验和感伤。这不是古典的,而是洋溢着现代精神的情绪,通过咖啡店的场景才能充分宣泄出来。就是这种罗曼蒂克的“咖啡店情调”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把创造社、太阳社的许多革命作家和知识阶层的热血青年吸引到“公啡”咖啡店来。

“公啡”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时,“公啡”已经成为文化人经常会聚处。夏公回顾:“我记得‘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是1929年10月中旬(双十节之后不久),地点在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的‘公啡’咖啡店2楼,参加者有潘汉年、画室(冯雪峰)、华汉(阳翰笙)、钱杏邨、冯乃超、彭康、柔石、洪灵菲、蒋光赤、戴平万和我(当时用的名字是沈端先),共11个共产党员。在咖啡店楼上包了一个单间,以聚餐的名义开会。”

笔者也询问过阳翰老,他证实了夏公的说法,并回忆了当时在“公啡”咖啡店2楼召开“左联”第一次筹备会的情况;惟一的差别是出席者的名单,据他记得:“出席人数是9个,皆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文化骨干:潘汉年、画室(冯雪峰)、沈端先(夏衍)、钱杏邨(阿英)、洪灵菲、冯乃超、柔石、李初梨和我(阳翰笙当时用的名字是华汉)。”而不是夏公所说的11人。按照阳翰老的回忆,出席者中没有彭康、蒋光赤、戴平万;而夏公的回忆中没有李初梨。

两位老前辈对于人名的回忆有些差别,到现在已经无从详细核对了。但可说是大同小异,主要其中有8个人的名单基本一致吧。

阳翰老说:“从1929年10月中旬到1930年3月,‘左联’筹备组织的前几个月期间,文化支部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指定冯雪峰同志负责跟鲁迅先生经常联系。接头的地方,多半就在北四川路底‘公啡’咖啡店2楼。”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街道支部书记的黄耀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回忆录证实了阳翰老的说法。老前辈们都认为:“公啡”咖啡店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诞生的摇篮。

为什么选中“公啡”咖啡店2楼作为这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左联”筹备会址呢?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考虑如下:第一,它在公共租界是一个犹太人开的店,是外国人常去的地方,巡捕房、“包打听”是不大注意的,比较安全;第二,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属于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后来改为文化支部,大多居住和工作地址就在附近,例如地下党领导的中华艺术大学就在不远的宴乐安路(今多伦路)145号,鲁迅住在景云里,夏衍住在吴淞路,等等。所以地下党才选中“公啡”作为聚会和联络的常用地点。

鲁迅先生和“公啡”咖啡店

1928年鲁迅在《革命咖啡店》一文中写道:“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烁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但是,当时鲁迅跟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作家们尚在论战,误会和隔阂有待解除,所以文中不无调侃嘲弄之意。鲁迅写道:“我是不喝咖啡的,还是绿茶好……这样的咖啡店里,我没有上去过。”

但是过了一年以后,鲁迅愉快地登上了“公啡”2楼。后来夏

公对我回忆道：“我曾记得1929年底，一天很冷的下午，鲁迅先生亲自到‘公啡’咖啡店出席了筹备‘左联’的聚会，跟潘汉年、冯乃超和我交谈得非常融洽。‘左联’的筹备会一般每周一次，需要时隔三天就碰头。地点固定在‘公啡’咖啡店2楼上一个包间里，西餐桌旁可容十几个座位。1930年1月下旬，就在‘公啡’咖啡店起草了‘左联’的纲领，协商了发起人名单；并一致决定在3月正式召开‘左联’成立大会。”（据我查核，夏衍回忆的具体日期有出入——笔者注）

1930年2月16日，“左联”的12名发起人鲁迅、冯雪峰、沈端先、华汉（阳翰笙）、柔石、冯乃超、钱杏邨、将光慈、郑伯奇、彭康、洪灵菲、沈起予（根据冯雪峰晚年回忆的名单）等人在“公啡”2楼包间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为题。当年3月出版的《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作了报道。而这一天的《鲁迅日记》载有“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的记录。可确认鲁迅出席了在“公啡”举办的这次重要讨论会。

当时在“公啡”酝酿成立的不仅有“左联”，还有“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即“剧联”。根据戏剧界老前辈赵铭彝回忆：“1929年—1930年，在田汉领导的南国社、洪深领导的复旦剧社、郑伯奇领导的艺术剧社等基础上，联合成立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筹备会也是在北四川路宴乐安路（今多伦路）口公啡咖啡店2楼举行的。”

老作家魏猛克回忆说：“1933年我参加‘左联’不久，周起应（周扬）带我到内山书店见到了鲁迅，一同到马路对面一个挪威人开的‘公啡’咖啡店去谈话。这个咖啡店比较僻静，鲁迅常在这里跟文学青年交谈，是值得纪念的地方。”但是鲁迅仍不随同大家一起喝咖啡，他单独点一杯绿茶。有时夏衍则陪着鲁迅喝茶。在西洋风味的咖啡店，却偏要喝中国绿茶，这也是文坛一绝吧。也很能说明鲁迅的性格特点。

茅盾、胡风先后担任过“左联”书记或执行委员，他们都是“公

啡”的常客。据说鲁迅和巴金也曾在“公啡”见面。

周扬夫人苏灵扬回忆说：“1934 年秋天我和周扬结婚。第二年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入狱。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下，我担任过周扬跟鲁迅先生的联络员。我先陪同周扬到北四川路底的‘公啡’咖啡店，他留在那里等候；我就去内山书店找到鲁迅先生，领他来到‘公啡’。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咖啡店座位是最普通的 4 座车厢式，鲁迅穿着长袍，嘴上含着嘴斗，烟雾袅绕。”交谈时，周扬夫妇喝咖啡，鲁迅喝茶。……

设想日历翻回到六七十年以前，你从上海外滩搭乘 1 路有轨电车，越过外白渡桥，铁轮载着两节方方正正的车厢微微摇晃，一路上丁丁当当悦耳的铃声伴随你来到北四川路底终点站。你下了车，迎面看见两个青年（柔石和殷夫）搀扶着一位穿长衫着布鞋的“老头子”横穿马路进入“公啡”咖啡店。你好奇地追随他们登上 2 楼，听见餐桌旁的人们在辩论《子夜》的文采、《灭亡》的风格；你看见西服革履气宇轩昂的“四条汉子”在研讨新的电影剧本，争执不休以至于面红耳赤；你看见丁玲正在审阅文学月刊《北斗》的稿件；你看见萧军、萧红正在跟书商洽谈《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出版事宜；你还看见几个“包打听”探头探脑东张西望，却没能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只觉得一两位客人不喝咖啡、专喝绿茶，有点儿古怪罢了。……你眼前展开这一切，难道不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精彩篇章吗？

[附]

关于“左联”与“公啡”的补充资料

20 世纪 30 年代“左联”成员冯润璋同志在晚年回忆说——
1928 年秋，中共中央提出，拟将中国的文艺界各团体和个人

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统一行动纲领和严密组织的革命文艺阵线,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参加革命活动。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中宣部干事兼文化委员会书记的潘汉年同志。当时,我已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在学校时与同班同学孟超、刘锡五等,组织过“流萤社”和出刊过“流萤半月刊”(由光华书局代售),因此,刘锡五、孟超等同学就把我推荐给潘汉年同志,参加筹备这个文艺组织。那时在上海文艺界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团体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太阳社”。“创造社”和“太阳社”比较激进,在青年中影响较大。潘汉年同志首先接触了创造社的冯乃超和太阳社的钱杏邨,以后又联络了陶希圣、孙伏园等知名人士。

第一次筹备会是潘汉年同志召集的,在北四川路“公啡”咖啡馆,参加的有潘汉年、冯雪峰、钱杏邨、冯乃超、沈端先和我,时间是一天下午,地址是“公啡”咖啡馆2楼,房间里有个长方形的旧木桌,我们6个人全是党员。首先潘汉年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意图,接着研究了当时文艺界的情况,并提出以争取言论出版自由、提高稿费、提高版税为口号。这个口号一提出,就得到了文艺界的支持和拥护,遂于该年年底在北四川路广肇公学的一个教室里开了一个“中国著作者协会”的成立大会,参加的有70多人。这个会我也参加,但未签名。在这会上结识了泰东月刊的编辑范香谷同志,当时因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残酷围剿,自己又无经济实力,所提出的两个口号都落空了,所成立的组织也就无形地自己解散了,这可以说是“左联”成立的第一阶段……

1929年秋季,由潘汉年召集,在上海北四川路“公啡”咖啡馆开了第二次会议,讨论了筹备“左联”的情况,觉得目前关于创造社与太阳社和鲁迅的矛盾一时难以解决,决定先成立“左联”,先一面工作一面再解决创造社与太阳社和鲁迅之间的矛盾。这时关门主义很严重……

晚年阿英回忆说:1929年4月左右,党说服各文艺社团解散,与鲁迅合作,联合起来。太阳社、创造社都同意党的建议。后来潘汉年等代表中央去找鲁迅谈,鲁迅同意合作成立组织。这个期间我参加过大约二三次与鲁迅谈话,都在北四川路“公啡”咖啡馆,多半是下午,有潘汉年、阳翰笙、冯乃超、夏衍、我等。冯雪峰有时也参加这种会议。我们对鲁迅检讨过,承认在论争中不应该用那种态度对待他,鲁迅也说了些团结的话。谈话时我们对鲁迅是尊重的,但思想上双方并未彻底解决问题。

阿英又回忆说:1929年秋天,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李富春同志(当时上海文化支部已改归江苏省委管理)曾找原创造社、太阳社等社团党员10来个人谈话,好像也在“公啡”咖啡馆,正式谈了与鲁迅合作成立“左联”的事。我参加了,记得有华汉(翰笙)、夏衍、雪峰、乃超、朱镜成、灵菲、林伯修等。

冯雪峰晚年回忆说——

大概在1929年年底或1930年年初,即在1930年2月开成立筹备会之前,产生了当时称做“基本构成员”12人……名单是汉年同冯乃超、阿英、夏衍和画室(冯雪峰)等人协商后提出的。这12人在“左联”成立之前开过两次会……2月间在“公啡”咖啡馆开的一次我还记得。《鲁迅日记》1930年2月12日(按:应为16日)记有“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大概就是这一天,鲁迅到会……记得鲁迅也说过话。当天推举了冯乃超起草《理论纲领》……

晚年冯乃超的回忆跟上述情况大致相吻合——

为了商议成立“左联”的有关事宜,我跟着潘汉年、雪峰、蓬子、侍珩一同去过鲁迅在上海景云里的寓所。我们还在“公啡”咖啡馆碰过头。这家咖啡店在北四川路有轨电车终点站附近,平时顾客不多,几乎被我们垄断了。郑伯奇、阿英也参加了成立“左联”的筹备会。我记得去过鲁迅家3次。